

# 公正解读中国国防费开支:从补偿性增长到协调性增长

夏庆<sup>a</sup>, 孙兆斌<sup>a</sup>, 刘思琦<sup>b</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a.基础部; b.国防经济系, 湖北 武汉 430035)

**摘要:** 文章受 Laurent Ferrara (2003) 启发, 选用 1978-2012 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时间序列作为实证数据, 运用 MS-AR 模型对该时间序列进行结构转换分析, 研究表明: 受国防发展战略影响, 中国国防费增长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1980-1988 年, 国防费处于负增长期, 平均增长率约为 -3.17%; 1989-1996 年, 国防费处于低增长期, 平均增长率约为 4.69%; 1989-2009 年, 国防费处于补偿性增长期, 平均增长率约为 11.99%; 2010-2012 年, 经济增速放缓, 国防建设与之协调, 其增长率明显减缓。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国防费增长具有补偿性、协调性以及防御性特征; 2010 年以来中国国防费的增长趋势有所变化, 在经历持续多年的补偿性增长后, 正从补偿性增长向协调性增长转变。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我国应该大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关键词:** 中国国防费; 补偿性增长; 协调性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15) 03-0085-06

## Read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 Impartially: From Compensatory Growth to Coordinated Growth

Xia Qing<sup>a</sup>, SUN Zhao-bin<sup>a</sup>, LIU Si-qi<sup>b</sup>

(a. 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b. Department of Defense Economics,

Military Economics Academ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uhan 43003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spired by Laurent Ferrara's research (2003), uses the time sequence of actual defense expenditure growth rate from 1978 to 2012 as the empirical data, and employs MS-AR model to make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on this time sequ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 growth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defense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pproximately gone through four states. From 1980 to 1988, the national defense expenditure was in the negative growth period, with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about -3.17 percent. From 1989 to 1996, it was in the lower growth period, with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about 4.69 percent. From 1989 to 2009, it was in the compensatory growth period, with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about 11.99 percent. From 2010 to 2012, China slowed dow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xpenditure kept its pace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slowed down considerab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 growth ha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mpensation, coordination and defense. The growth tendency of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 has experienced some changes, and is shifting from compensatory growth to coordinated growth since 2010 after years of constant compensatory growth.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deeply in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elds so as to more effectively facilita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words:**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 compensatory growth; coordinated growth

### 一、引言

近十几年来, 中国国防费开支保持了连年增长的势头: 从 1998 年到 2012 年, 中国国防费开支分别为 934.7 亿元、1 076.4 亿元、1 207.54 亿元、1 442.04 亿元、1 707.78 亿元、1 907.87 亿元、2 200.01 亿

元、2 474.96 亿元、2 979.38 亿元、3 554.91 亿元、4 178.76 亿元、4 951.1 亿元、5 333.37 亿元、6 027.91 亿元、6 691.92 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 从 1998 年到 2012 年 (除 2010 年外), 中国国防费开支逐年递增 10% 以上 (以上数据来自《统计年鉴》)。

收稿日期: 2014-08-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BJY154); 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课题 (QJJSJJYJZX2012KTLX-056)

作者简介: 夏庆 (1975-), 男, 湖北黄石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防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孙兆斌 (1966-), 男, 安徽太湖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防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刘思琦 (1978-), 女, 湖北武汉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防经济学。

某些外国媒体拿中国国防费增长做文章，大事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有意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们声称，随着中国国防费的快速增长，中国会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给周边地区带来动荡与纷争。对此，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防费增长是适度的，是对过去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是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增长。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可某些国家还是心存疑虑。那么，中国国防费在最近十几年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随着中国国防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真的会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吗？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公正解读中国国防费开支，基于实证数据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驳斥。

国防费，是指一个国家为了确保其安全的需要，由其政府投入国防建设的经济资源的价值反映。国防费是一个国家国防政策的经济表现，是数字化的国防政策。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防费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国防政策的防御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几乎不涉及，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就国防费自身出发，说明国防费增长的合理性，体现国防政策的防御性本质。王伟宏(2007)<sup>[1]</sup>定性阐述了中国国防费增长具有补偿性、有限性、防御性和协调性特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是荒谬的。刘忠生等(2008)<sup>[2]</sup>引入国家安全威胁度概念，运用国防支出决定模型，发现中国当前的国防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实际国防支出没有超出基本的防御性国防安全需求。第二，围绕国防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国防费增长的合理性。姜鲁鸣等(2007)<sup>[3]</sup>通过模型分析，说明现阶段中国国防支出并没有超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限度，关于中国“军备扩张”的观点是错误的。黄瑞新等(2008)<sup>[4]</sup>指出中国国防费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防活动的大幅扩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国防人力和装备价格的上涨。中国国防战略逐渐摆脱以往的“忍耐观”，形成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提高国防支出，增加国防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牛晓健等(2009)<sup>[5]</sup>通过对国防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中国国防支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适当增加，但都处于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现有研究文献存在如下局限性：第一，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国防政策尤其是国防发展战略会相应做出调整。作为国防资源价值最集中

体现的国防费数据很有可能蕴含着这种调整信息。整个国防费增长路径，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着不同国防发展战略以及不同阶段特征的国防费数据。通过这种更精细地考虑，可以得到更为准确、更有意义的结论。显然，现有研究文献对此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第二，不断调整的国防发展战略是难以直接观测到的潜在变量。现有文献的研究工具基本上以线性模型为主，而线性模型难以捕捉到潜在变量的变化。MS-VAR模型在涉及潜在变量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Laurent Ferrara (2003)<sup>[6]</sup>运用该模型获得了三个区制的时间划分表，这个时间划分表和NBER划分经济周期的时间表非常接近，说明选取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受到了经济周期转换的影响。

本文受Laurent Ferrara (2003)启发，选用1978-2012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时间序列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AR模型对该时间序列进行结构转换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受国防发展战略影响，中国国防费增长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80-1988年，国防费处于负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3.17%；1989-1996年，国防费处于低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4.69%；1989-2009年，国防费处于补偿性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11.99%；2010-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国防建设与之协调，其增长率明显减缓。利用MS-VAR模型得到的时间划分表和实际国情十分吻合，说明该时间序列受到了国防发展战略（这一潜在变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国防费增长具有补偿性、协调性以及防御性特征。2010年以来中国国防费的增长趋势有所变化，在经历持续多年的补偿性增长后，中国国防费正从补偿性增长向协调性增长转变。

全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实证模型说明，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意义。

## 二、实证模型说明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的特殊情形就是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单变量自回归模型(MS-AR)。运用MS-VAR模型作为实证模型时，如果样本是单一时间序列（例如，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数据时，MS-VAR模型就退化为MS-AR模型。

滞后 $P$ 阶的 $K$ 维VAR模型有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截距式： $y_0, y_1, \dots, y_{t-p}$ 为固定值， $y_t = v + A_1 y_{t-1} + \dots + A_p y_{t-p} + u_t$ ， $t=1, \dots, T$ ， $u_t \sim \text{i.i.d. } N(0, \Sigma)$ ；另一种是均值调整式： $y_t - \mu = A_1 (y_{t-1} - \mu) + \dots + A_p (y_{t-p} - \mu) + u_t$ ，



$u=(I_k-\sum_{j=1}^p A_j)^{-1}v$  是  $y_t$  的  $K \times 1$  维均值。如果时间序列向量  $y_t$  受某潜在变量  $s_t$  的控制, 那么, 其数据生成过程受潜在变量  $s_t$  支配。在本文中, 如果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受某潜在变量 (例如国防发展战略) 影响, 那么, 其数据生成过程会受国防发展战略支配, 呈现出区制阶段性特征。如果国防发展战略有三种状态, 即  $s_t=\{1, 2, 3\}$  (1 表示“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国防发展战略; 2 表示“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国防发展战略; 3 表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发展战略), 且满足状态概率转移矩阵  $P=(P_{ij})_{3 \times 3}$ ,  $P_{11}+P_{12}+P_{13}=P_{21}+P_{22}+P_{23}=P_{31}+P_{32}+P_{33}=1$ 。在每一个不同区制, 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均值都应该显著不同。时间序列向量  $y_t$  均值依赖  $s_t$ 、3 区制、滞后 2 阶的 MSM(3)-VAR(2) 模型可写成:

$$y_t - \mu(s_t) = A_1(y_{t-1} - \mu(s_{t-1})) + A_2(y_{t-2} - \mu(s_{t-2})) + u_t, \\ u_t \sim \text{i.i.d.} N(0, \Sigma)$$

当  $s_t=1$  时,  $\mu(s_t)=\mu_1$ ; 当  $s_t=2$  时,  $\mu(s_t)=\mu_2$ ; 当  $s_t=3$  时,  $\mu(s_t)=\mu_3$ 。当  $K=1$  时, MSM(3)-VAR(2) 模型退化为 MSM(3)-AR(2) 模型。本文采用 MSM(3)-AR(2) 模型作为实证模型。

###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一) 选取样本数据

选择 1978-2012 年实际国防费和实际 GDP 数值作为样本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为了获得 1978-2012 年的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数值, 先计算以 1952 年为基期的 GDP 平减指数, 再将 1952-2012 年的名义国防费数值通过该指数平减, 从而获得实际国防费数值。然后, 对实际国防费数值取对数, 再取差分, 获得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数值, 最后截取 1978-2012 年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图 1 给出了 1979-2012 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的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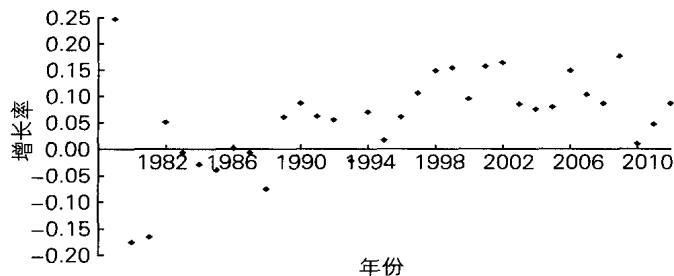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12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

从图 1 看出, 1979 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为 24.7%, 远远高于其余年份增长率, 原因在于这一

年爆发了中越局部战争。因此, 在后续实证中, 将 1979 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作为异常点除去。这样, 全部数据从 1980 年开始起算。

#### (二) 平稳性检验

使用 ADF 方法对 1980-2012 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 ( $\Delta \ln \text{DEF}_t$ ) 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

表1 单位根检验

变量	$I(c, t, d)$	ADF 统计量	t 统计量临界值 (5% 显著性水平)	是否存在 单位根
$\Delta \ln \text{DEF}_t$	$(c, 0, 0)$	-3.606 6	-2.957 1	$I(0)$

注:  $c$  表示有截距项,  $t$  表示有时间趋势,  $d$  表示滞后项。

可见, 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 ( $\Delta \ln \text{DEF}_t$ ) 是平稳的。

### 四、实证分析

利用 MS-AR 模型, 捕捉国防发展战略对实际国防费增长率的影响效果。按 Krolzig (1997)<sup>[10]</sup> 的观点, 当区制发生转换后, 如果均值演变路径是突变的, 建议使用 MSM 模型系列。国防发展战略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 当国防发展战略变化时, 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的演变路径有可能迅速做出反应, 发生结构性突变。所以, 使用 MSM 系列模型作为分析模型。

图 2 是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和实际 GDP 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图。观察图 2, 不难看出国防费增长率序列大致可以划分为 3 个区制: 第一个区制的数值几乎都在  $x$  轴下方, 是负数; 第二个区制的数值基本上都在 0 和 0.1 之间; 第三个区制的数值几乎都在 0.1 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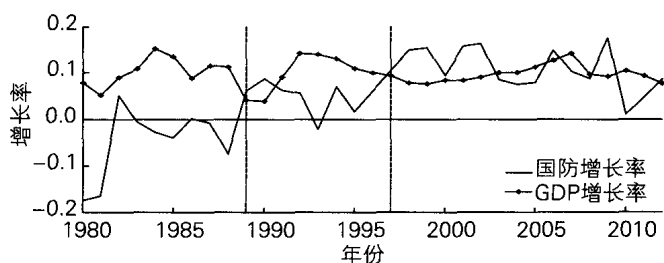


图2 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和实际 GDP 增长率的时间序列

#### (一) MS-AR 解释模型的选择

Krolzig (1997) 认为应该遵循从下至上的策略 (bottom-up Strategy) 而不是从上至下的策略来确定最合适的 MS-AR 模型。所谓从上至下的策略, 就是从估计较多约束的 MSMAH (M) -AR (P) 出发, 寻找最合适的解释模型。所谓从下而上的策略, 就是从估计较少约束的 MSM (M) -AR (P) 模型出发, 寻找最适合的解释模型。如果遵循从上而下的

策略，会承担似然函数值收敛于局部最大的风险。按照从下而上的策略，对MSM(3)-AR(P)模型进行估计，选择最合适的P值。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MSM(3)-AR(P)中P的确定

模型类型		滞后阶数		
		1 阶	2 阶	3 阶
MSM (3)-AR (P)	logL	45.748 0	54.717 7	55.801 5
	AIC	-2.106 0	-2.589 0	-2.594 0
	HQ	-1.938 2	-2.405 8	-2.395 7
	SC	-1.607 2	-2.044 8	-2.004 5
	LR	17.587 5 Chi(2)=[0.000 2]** Chi(8)=[0.024 5]* DAVIES=[0.002 8]**	35.524 9 Chi(2)=[0.000 0]** Chi(8)=[0.000 0]** DAVIES=[0.000 0]**	34.294 6 Chi(2)=[0.000 0]** Chi(8)=[0.000 2]** DAVIES=[0.000 0]**

注：\*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MSM(3)-AR(2)模型的logL值为54.717 7，MSM(3)-AR(3)模型的logL值为55.801 5。LR=2×(55.801 5-54.717 7)=2.167 6，而LR渐进服从 $\chi^2(1)$ ，因为 $\chi_{0.95}^2(1)=3.841 5$ ，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难以拒绝原假设，认为P=2更合适。

在确定滞后阶数后，会在MSM(3)-AR(2)，MSMA(3)-AR(2)，MSMH(3)-AR(2)，MSMAH(3)-AR(2)中选择最适合的解释模型。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选择合适的解释模型

模型类型		数值	模型类型		数值
MSM(3)-AR(2)	logL	54.717 7	MSMH(3)-AR(2)	logL	54.826 2
	AIC	-2.589 0		AIC	-2.474 3
	HQ	-2.405 8		HQ	-2.260 7
	SC	-2.044 8		SC	-1.839 4
	LR	35.524 9 Chi(2)=[0.000 0]** Chi(8)=[0.000 0]** DAVIES=[0.000 0]**		LR	35.742 0 Chi(4)=[0.000 0]** Chi(10)=[0.000 1]** DAVIES=[0.000 0]**
MSMA(3)-AR(2)	logL	39.595 2	MSMAH(3)-AR(2)	logL	39.595 2
	AIC	-1.430 0		AIC	-1.308 8
	HQ	-1.185 9		HQ	-1.034 1
	SC	-0.704 4		SC	-0.492 5
	LR	5.279 9 Chi(6)=[0.508 4] Chi(12)=[0.948 0] DAVIES=[1.000 0]		LR	5.279 9 Chi(8)=[0.727 3] Chi(14)=[0.981 5] DAVIES=[1.000 0]

注：\*\*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按照logL尽可能大，AIC准则、HQ准则、SC准则尽可能小的原则，在MSM(3)-AR(2)和MSMH(3)-AR(2)之间进行选择，MSM(3)-AR(2)的logL为54.717 7，MSMH(3)-AR(2)的logL为54.826 2。LR=2×(54.826 2-54.717 7)=0.217。由Krolzig(1997)知LR渐进服从 $\chi^2(1)$ ，因为 $\chi_{0.95}^2(1)=3.841 5$ ，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难以拒绝原假设，认为MSM(3)-AR(2)模型更合适。

MSM(3)-AR(2)模型的LR检验结果显示，LR线性检验量为35.524 9，当自由度是2和8时，都以1%的水平显著，说明对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使用非线性模型回归要优于线性模型。

(二) MSM(3)-AR(2)模型的光滑概率图以及区制转换时间

图3-5分别对应区制1、2、3的光滑概率图以及区制转换时间。从图3可以看出，1980-1988年属于区制1；从图4可以看出，1989-1996年以及2010-2012年属于区制2；从图5可以看出，1997-2009年属于区制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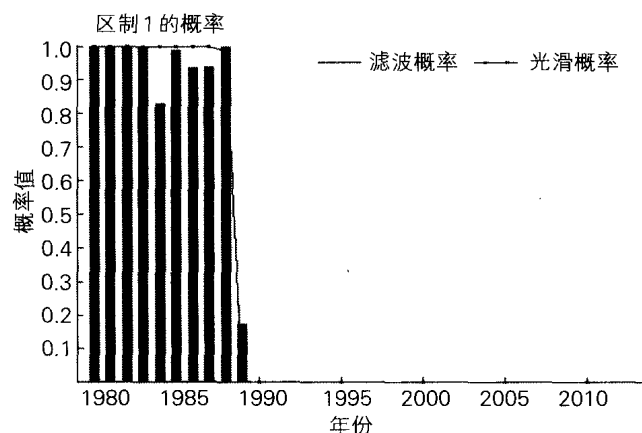


图3 区制1的光滑概率图以及区制转换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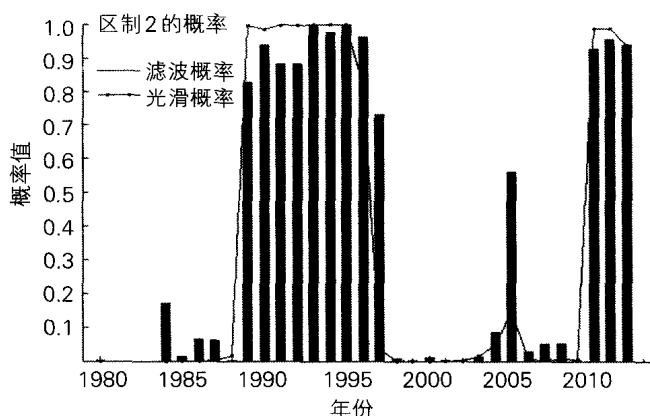


图4 区制2的光滑概率图以及区制转换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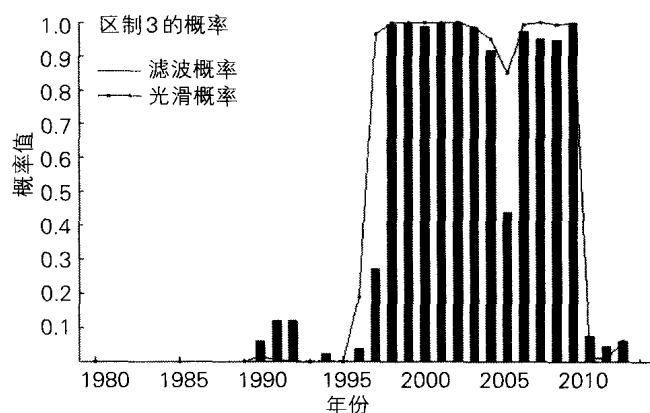


图5 区制3的光滑概率图以及区制转换时间

### (三) MSM(3)-AR(2)模型的估计系数

表4是国防费实际增长率MSM(3)-AR(2)模型的估计系数。该表表明,所有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

表4 MSM(3)-AR(2)模型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国防费实际增长率
区制1均值	-0.031 7***
区制2均值	0.046 9***
区制3均值	0.119 9***
滞后一阶	-0.260 9***
滞后二阶	-0.454 9***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1980-1988年(区制1),区制1的国防费平均增长率是-3.17%,属于负增长期,这一阶段的国防发展战略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从图2可以看出,在区制1内,除1982年国防费增长率为正值外,其余年份的国防费增长率都是负值。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将主要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建设,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建设。为支援经济建设,国防经费明显下滑,国防费绝对值从1980年的158亿元减至1988年的120亿元。

1989-1996年(区制2),区制2的国防费平均增长率是4.69%,属于低增长期,这一阶段的国防发展战略是“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从图2可以看出,除1989年和1990年外,其余年份国防费增长率都低于GDP增长率。在这一阶段,军队为支持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国防费保持低幅度的增长,军费存在较大缺口。

1997-2009年(区制3),区制3的国防费平均增长率是11.99%,属于补偿性增长期。这一阶段的国防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中国国防费在经历了负增长期和低增长期后,国防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中国政府在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国防费,但这种增长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从图2可以看出,即使在补偿性增长期,也不是所有年份的国防费增长率都超过了GDP增长率。这一时期,GDP增长率超过国防费增长率的时间为5年,占全部时间的38%;国防费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的时间为8年,占全部时间的62%。这充分说明: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国防费开支都是最低限度地满足国防现代化和国家防御的需要,只要不出现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情况,国防

费就不会有大幅度实质性的增加。

2010-2012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分别为1.00%、4.72%和8.62%,MS-AR模型将这三年划归到国防费的低增长期。仅凭三年的数据,尚不能断定国防费增长重新进入低增长期,但最近三年增长速度放缓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发展战略依然是影响国防费增长突变的主要原因: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国内物价出现波动,国家财政重点保障民生和社会亟须项目的支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费增长显著下降。2011-2012年,GDP增速逐年下降,经济发展减速,国防建设与之相适应,这两年的国防费增长率明显低于补偿性增长期。

利用MSM(3)-AR(2)模型得到的区制划分时间表和我国国防事业发展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说明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的确受到了国防发展战略这一潜在变量的影响。

### (四) MSM(3)-AR(2)模型的区制转移概率矩阵以及状态持续期

表5反映了MSM(3)-AR(2)模型区制转移概率矩阵以及状态持续期。该表数据表明,三个区制的稳定性都很高。当中国处于国防费的负增长期时,区制1自身的持续概率为0.899 9,平均持续期约为9.99年。当中国处在国防费的低增长期时,区制2自身的持续概率为0.873 0,平均持续期约为7.87年。当中国处在国防费的补偿性增长期时,区制3自身的持续概率为0.906 2,平均持续期约为10.66年。

表5 区制转移概率矩阵以及状态持续期

项目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样本数量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0.899 9	0.100 1	2.031e-010	9.0	9.99
区制2	1.223e-006	0.873 0	0.127 0	11.0	7.87
区制3	9.270e-012	0.093 80	0.906 2	13.0	10.66

## 五、结论及政策意义

### (一) 结论

中国国防费在最近十几年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随着中国国防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真的会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吗?本文选用1978-2012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时间序列作为实证数据,借鉴Laurent Ferrara(2003)的分析方法,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利用MSM(3)-AR(2)模型得到的区制划分时间表和中国国防事业发展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

这一实证结果有力说明了实际国防费增长率序列的确受到了国防发展战略这一潜在变量的影响。

(2)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防费增长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80-1988年,实际国防费处于负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3.17%,当时的国防发展战略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1989-1996年,实际国防费处于低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4.69%,当时的国防发展战略是“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1989-2009年,实际国防费处于补偿性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11.99%;2010-2012年,经济发展减速,国防建设与之相适应,其增长率明显减缓。1989-2012年期间的国防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协调发展”。

(3) 国防发展战略从“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协调发展”,导致国防费增长路径与之相适应,体现出补偿性、协调性以及防御性特征。具体来说:1989-2009年,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政府逐步加大国防投入,实际国防费增长较快,但就其属性而言,这种增长是对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同时,这种增长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增长相协调的增长,具有协调性特征。在这一时期中,GDP增长率超过国防费增长率的时间为5年,占全部时间的38%。国防费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的时间为8年,占全部时间的62%。可见,即使在国防费增长较快时期,国防建设依然服从于经济建设,体现出中国国防费增长的防御性特征。1989-2009年,中国国防费增长具有明显的补偿性、协调性以及防御性特征。2010-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其增长率明显放缓。这三年的国防费增长具有明显的协调性特征。

(4) 1989-2009年,中国国防费增长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其补偿性特征显著。在经历持续多年的补偿性增长之后,中国国防费增长的补偿性特征逐渐减弱,协调性特征愈发愈强。2010年以来,中国国防费的增长趋势有所变化,中国国防费正从补偿性增长向协调性增长转变。

## (二) 政策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本文的实证结果为驳斥“中国军事威胁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研究表明,中国国防费在最近十几年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对过去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其增长过程带有明显的“补偿性”、“协调性”和“防御性”特征;其次,中国国防费增长的发展趋势正发生微妙变化。在经历持续多年的补偿性增长后,2010年以来国防费增长正迈入协调性增长阶段。这充分说明,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作为世界和平的正能量,中国国防费的增加,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福音;最后,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作者建议,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较为健全的军民融合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军工和民口资源的互动共享,加快提升军民结合高科技产业规模。

## 参考文献:

- [1] 王伟宏. 解析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驳“中国军事威胁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7(4): 60-69.
- [2] 刘忠生, 李东. 中国国防支出的实证分析[J]. 军事经济研究, 2008(2): 13-16.
- [3] 姜鲁鸣, 王碧波.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资源均衡配置——均衡状态下的国防支出增长机制研究[J]. 财经研究, 2007(3): 87-100.
- [4] 黄瑞新, 周亮. 国防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及综合模型分析[J]. 军事经济研究, 2008(8): 19-22.
- [5] 牛晓健, 陶川, 钱科. 中国的国防开支会构成军事威胁吗?[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6): 28-34.
- [6] Laurent Ferrara. A three-regime real-time indicator for the US economy [J]. Economics Letters, 2003, 81: 373-378.
- [7] 夏庆, 陈春. 国家战略调整: 国防建设为主还是经济建设为主——基于MS-AR模型的实证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3): 89-94.
- [8] 潘敏, 夏庆, 张华华. 货币政策周期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J]. 财贸研究, 2012(1): 1-7.
- [9] 夏庆, 陈春, 万文应. 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基于MS-VECM模型的实证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3): 113-118.
- [10] Krolzig H M. Markov 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Model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Cycle Analysis [M]. Berlin: Springer, 1997.

[责任编辑: 欧世平]